

嚮導叢書第四種

論 北 伐

一九二六年九月印行

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

這是一本集子，包括中國共產黨所有宣言告民衆書等。讀者在這本集子中，可以看見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那一時期，都是站在民衆前面，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正是中國廣大民衆最迫切的要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之前鋒。初版一萬份早已售罄，再版不日出書。

定價大洋一角

論北伐目次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陳獨秀

我們的北伐觀.....

彭述之

答張人傑等論北伐書.....

陳獨秀

附 張人傑書

符 紹書

黃世見書

冥 飛書

民衆心目中的廣東.....

張國棟

論北伐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陳獨秀

北伐的意義，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在此時北伐聲中，我們若不懂得這個意義，便會發生許多錯誤的觀念及行動。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衆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這種軍事行動，對於推翻軍閥確是一種重要方法，然亦僅僅是一種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衆，若誤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弔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慾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

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

現在廣州國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樣呢？在第一點，他自然還不是直接的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在第二點，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確有坐待北伐軍到來之幻想。在第三點，我們敢肯定的說，現在國民政府之北伐還不是由於革命力量膨脹而向外發展，乃是因為吳佩孚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衛。在第四點，國民政府之北伐戰費，應該發行軍事公債，向紳富籌募，如果因北伐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向農工平民搜刮，不但當年中山先生不會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現時唐生智在湘南，軍費並不比廣東寬裕，他只發行殷實公債，而未向農民誅求，國民政府對農民政策總不應該比唐生智不如。國民二軍之潰敗，對農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來國民政府對農民的態度，已經使農民懷疑，若再因北伐戰費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若更進而剝奪廣東革命的民衆從護法政府以來所獲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給予反革命的買辦土豪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則我們在野黨應該向政府嚴重勸告：必須北伐與民衆利益雙方兼顧，如此才能鞏固國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謂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現在尙未成問題；因為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個的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所屬軍隊之戰鬥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尙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

帝國主義者早已定下了吳張分途討滅南北二赤的計劃，如此英吳日張分據南北，才能和緩他們當中衝突；現在英吳對日張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讓步，則吳佩孚南下進攻廣東，無論對國民軍作戰勝敗，都必得張作霖之援助而實行。吳佩孚一回漢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進攻廣西，屆時動搖不定的小軍閥如贛鄂閩周，都必然決定態度，奉吳令一致向廣東進攻；不但如此，還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封鎖於外，陳林魏邦平舊部，勾結土匪土豪官僚買辦，擾亂於內；如果竟至如此，國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神經過敏，這樣危險的局勢，實已迫在目前，絲毫不容我們忽視。

所以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廣東民衆的口號，也

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全國民衆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

將陷於四面圍攻的國民政府，他的領袖們，應該和衷共濟，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革命軍正爲此和軍閥戰爭，也就是革命軍和軍閥不同之一點）。使人民心悅誠服的和國民政府合作，以戰勝此困難，使此困難不但不能覆滅國民政府，轉而能夠鍛鍊國民政府領袖及其軍隊和一切民衆的革命意志與戰鬥力，然後再匯合全國民衆革命的勢力，進而北伐，才能夠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國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

我們的北伐觀 彭述之

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現在已由宣傳醞釀而見諸實際行動了，并且北伐軍在事實上已經攻下岳陽，逼取武漢，因此「北伐」在中國目前政局上已成了一個中心問題，已成了各社會階級和各方面的實際勢力注意之焦點。從帝國主義反動軍閥資產階級研究系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以至於工農羣衆，對於北伐不管贊成與反對，差不多都

有相當的表示。可是『北伐』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北伐的真正意義在那裏，直到現在大家還不大了解，多是含糊誤會。帝國主義反動軍閥研究系國家主義派……等，固然不用說對於北伐，是信口雌黃，任意誣譏，就是北伐的本身（國民黨，北伐軍）和贊助北伐的民衆也多誤會，他們不是過於誇張，便是過於輕視。這種過於誇張或輕視的態度，對於北伐前途的進行上，即對於北伐的實際策略和實際行動上，都不免要陷於主觀，這是很危險的。現在北伐雖然是浩浩蕩蕩的前進，雖然給了參加北伐和贊成北伐的人們以無限的希望，可是北伐的前途還是很艱難的。北伐的真正意義在那裏，北伐前途究竟有多少希望，還是很值得我們詳細研究的。

我們爲了要答覆一切反動派對於北伐的誣譏，要解釋一切民衆對於北伐的誤會，總之，要使北伐更順利的進行，使北伐將來能得到更大限度的效果，那我們每個誠實的革命者，我們每個忠實地參加北伐和擁護北伐的人，對於北伐的真正意義，這回北伐在中國目前民族解放運動上的意義，都有更明確地來認識，更深切地來了解之必要。只有明確認識與深切了解之後，才可以免除我們主觀上過分的誇張和輕視，那時我們的實際策略和行動才可以減少錯誤，才可以順利進行。

(一) 北伐之歷史根源

我們要了解此次北伐的真正意義，須首先明白牠的歷史根源。北伐并不是憑空而來的東西，牠有經濟的政治的背影，這種經濟和政治的背影，又為長遠的歷史所形成。

大家都知道，「北伐」這個口號不是什麼新的花樣，在近幾十年的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好幾次，太平天國之「北伐」，姑且不提，單就辛亥革命以來，便已經有了三次：（一）辛亥革命軍的北伐；（二）民六南方護憲政府之北伐；（三）民國十三年江浙戰爭時孫中山先生之聲言北伐（彼時在北伐的本身力量上雖然有點滑稽，但中山先生確曾發表過北伐宣言，并進兵韶關），此外如民四西南討袁稱帝之役，雖然沒有北伐的口號，也可以說帶有北伐的性質。自然這幾次的北伐都帶有誇張的性質，不是「北伐」本身的力量到了真能討伐敵人的程度，而多是因受敵人的壓迫而起的一種防禦戰爭（如護憲如討袁，實際上只算是防禦南伐）。不過這幾次的北伐，在其性質上有一個共同的點，便是反抗或企圖消滅北方的封建勢力，即北伐的對象是北方的封建階級——滿洲政府及其後身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而北伐本身則皆為代表南方一種幼稚的革命勢力的軍事力量（不管當時那些北伐的本身如何複雜，投機，有多少缺點，如護法軍討

袁軍等，但在當時客觀上始終是代表南方革命勢力反抗北方封建勢力的一種軍事力量）。總之，歷次北伐，在其性質上都帶有一種南方革命勢力企圖向北發展，剷除北方封建勢力或抵抗北方封建勢力南侵的傾向——即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由南而北的傾向。但是這種傾向的原因何在呢？這裏便到了經濟的和政治的問題了。

原來中國近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是由南而北，由海濱而陸地。在古代的中國經濟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并且其發展的趨勢是由北而南（指唐宋以前），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完全建築在自給的農村經濟上。到了西方帝國主義將牠們的商品強行輸入以後，長江和珠江流域的商業發展便一日千里，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商業資本主義，并且還有少數近代的產業發生，使舊時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而終於破產。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如華僑，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兵匪，以及少數工人，便成了革命的種子了。而在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等地直到現在大部分還是停滯在純粹的封建的農業經濟狀況之下，雖然沿海沿鐵路的地方如山東直隸奉天商業亦頗發展，并且有不少的近代產業，可是比起長江和珠江流域來還是要幼稚得多，尤其在整個的經濟制度上，無論如何，北方比南方要落後一步。

在政治上中國歷代封建勢力的根據地又都在北方（自滿洲政府至現時之北洋軍閥都在北方），也就正因為北方經濟比較落後，而宜於此種封建勢力之生存和發展。同時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為要在中國實現其經濟侵略之目的，維持其特殊地位，便不能不利用中國舊統治階級的勢力，因此便必須維持北方此種封建勢力——滿洲政府直至現時之張吳，以為牠們侵略之工具。因此，在政治方面，北方也較南方落後，南方的民衆比較在北方要自由。

由以上經濟和政治的原因，中國的革命勢力自然容易產生於南方並且容易發展，而在另一方面，北方的封建勢力，因落後的經濟與帝國主義之維繫，能延長其命運——因而形成近數十年來南方革命勢力與北方封建勢力互鬥之形勢。我們來看一看實際的情形。太平天國的革命勢力不用說完全發生於兩廣，便是辛亥革命之先鋒軍的同盟會一班領袖差不多都是南產（如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黃興宋教仁陳英士……等），至於參加辛亥革命之羣衆不用說是南方的華僑會匪新軍和新智識階級等分子了。

而在封建的勢力恰好相反，滿洲政府的皇族不待說，封建軍閥如皖如直如奉無一不是北方的產品，所有軍閥的領袖自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以至孫傳芳，沒

有一個不是產生於北方。自然南方也出了不少軍閥，如唐繼堯趙恒惕陳炯明陸榮廷等，可是這些小軍閥差不多曾經多少參加過革命，他們都是從革命的隊伍裏反叛出來的，而他們的反叛又多因北方軍閥之威脅和利誘，並且這些軍閥雖然反動，但表面上還時常要帶什麼聯省自治一類的假面具，藉以欺騙民眾，這也就可以看出他們與北方軍閥不同之處。至於革命的勢力自然在北方也有相當發展，也會經過許多革命黨人，尤其近來北方的鐵路工人，唐山的礦工，河南直隸的農民以及許多青年學生，都已經漸漸成為北方偉大的革命勢力，不過這些都是最近發展起來的（在五四運動後），還沒有成為一種堅強的有組織的羣衆力量，不能直接給北方封建軍閥以致命的打擊。

在南北根本上既然形成兩種相反的政治勢力，因而自然形成歷年來的政治鬥爭。自辛亥以來北方的封建勢力和南方的革命勢力差不多在兩相對峙的狀態之下，不是南方革命勢力企圖討伐北方封建勢力——所謂「北伐」，便是北方反動軍閥勢力征討南方——可以謂之「南伐」，或利用南方革命叛徒搗亂使自相殘殺。民國十五年來的歷史，除了北洋軍閥因帝國主義的唆使自相爭鬥以外，便是此種南北相反的政治勢力互相鬥爭的歷史。如果北方的封建軍閥不消滅，或者北方的民眾革命勢力不形成起來，此種兩

北鬥爭的歷史是要延長下去的。

由上面說來，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北伐』是有政治經濟的背影，有歷史的根源，有相當的革命意義。

至於說到這次國民政府的北伐，除了以上所說的歷史根源外，其直接原因是由於吳佩孚的『南伐』，即吳佩孚侵佔長沙，企圖進攻廣東。而吳佩孚的南伐又是五卅運動的結果。由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而引起反對奉系軍閥的戰爭，由反奉戰爭而引起奉吳聯合的反國戰爭，以至於吳佩孚企圖進攻廣東侵入湖南的戰爭。總之，由中國民眾和接近民眾的軍事勢力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奉戰爭而引起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反動軍閥之反攻，即所謂『反赤』或『討赤』。『反赤』是反國民革命，是現時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之反對國民革命運動的總口號。因此，這次的北伐是反赤的直接影響，是反赤運動逼迫出來的。國民政府的北伐雖然早就在準備，但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反赤工具吳佩孚之壓迫，還沒有如此之快，故這次北伐是防禦『反赤』的進攻，含有制止『反赤』的性質，含有繼續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性質。但是現在北伐的發展已由防禦而轉為進攻的形勢了。

(二) 前此北伐失敗之原因

我們已經知道北伐在歷史上不是一次，前此的北伐都是失敗了的。但是失敗的原因在那裏呢？這是值得我們追究的。我們知道，北伐是一種革命的表現，但是革命是有一定的步驟的，革命的進行必須按照革命步驟才有勝利之可能。第一步是宣傳，宣傳羣衆使其了解自身的痛苦和痛苦的來源以及解除痛苦的必要和方法；換言之，即須使羣衆認識自己的地位和真正的敵人，了解革命的必要及怎樣革命的方法。第二步是組織，革命是一種奪取政權的死活鬥爭，如果革命羣衆沒有堅強的組織，只是烏合之衆，那絕對不會成功。所以革命的第二個步驟必須將各種革命羣衆組織成爲一種戰鬥的力量，並且還須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作一切羣衆組織的重心，担负最高的指揮責任。第三步則爲武裝暴動或軍事行動，即武裝羣衆以羣衆的武裝解除壓迫階級的武裝，奪取政權，以建設羣衆所需要之新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社會。自然宣傳與組織絕不是死板板地劃分某一期專作宣傳某一期專作組織，而是要同時並進的，即是武裝暴動也是時常要準備的，可是這三個步驟，如果有一不備，革命是很難成功的；革命沒有軍事行動固不能成功，但只有軍事行動而無羣衆的宣傳與組織，那也沒有成功之可能，即或偶然軍事

勝利，結果只能算是幾個軍人的勝利，至多不過能成功一時的軍事獨裁，絕不能成功羣衆的革命。總之，凡是革命的軍事行動，必須羣衆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到了一定程度，軍事力量要由羣衆內部發展出來的，即是革命的武裝須建築在羣衆的基礎上，而絕不是像軍閥或資產階級的雇佣軍隊，如此，才有成功羣衆革命之可能。可是自辛亥以來的革命，便只有軍事行動而無羣衆的宣傳與組織（自然也沒有堅強的政黨作領導）尤其對於北方民衆差不多簡直沒有顧及，歷次北伐便是單純的軍事行動之表現，這種單純的軍事行動便是歷次北伐失敗之根本原因，也就是中國近年來革命失敗之根本原因。

自中山先生創辦興中會到辛亥革命之前夕，中國所有的革命準備工作差不多都集中在軍事行動一點，如運動會匪和新軍等，很少注意到當時羣衆的宣傳和組織，如農民手工業者國內商人都^{是當時真正的}是當時的革命羣衆，可是當時的革命黨人很少注意到此，很少在這些羣衆作宣傳與組織的工作，因此革命黨自身的組織自然也不能擴大和強固（中山誠然是個偉大的革命者，革命的偉大領袖，但只專注意軍事行動而忽略羣衆的宣傳與組織，這不能不說是中山先生革命多次失敗之重要原因）。因此辛亥革命雖然爆發了，但結果只憑一些新軍和會匪形成的軍事勢力，去打當時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階

般，民衆尤其北方的民衆又沒有積極參加和擁護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就成了流產。南方雖然有幾省的督軍是革命黨人，但不久那些督軍因為沒有民衆的監督，都一個一個地不是脫離革命投降敵人，便是無形墮落而爲新式軍閥了。到了討袁護憲等役，那更無容說，只是簡單的軍事行動。辛亥前雖然缺乏羣衆的宣傳與組織，但始終還有民報民呼報……等一類的宣傳機關和會匪華僑同盟會等一類的組織，但到辛亥以後連這些東西都沒有了。所以討袁護憲等的北伐其實不過南方幾個革命軍人和投機的新式軍閥與北洋軍閥的混戰而已，離真正革命的軍事行動真是一萬八千里！所以在當時的民衆看來，自然以爲與他們沒有關係，如此焉有不敗之理？自然以前北伐的失敗在客觀上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但是這個只單純地作軍事行動，是一切失敗原因之最主要的原因。

這一次的北伐，當然比以前大大的進步了，因爲中國近兩年來，尤其自五運動後，一般民衆的革命認識與要求，都有猛烈的發展，在組織上也有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工人和一部分農民羣衆，他們不但了解他們的痛苦和痛苦的來源，了解革命的必要，并且還相當了解革命的方略，有了偉大的組織（如上海廣東工人和粵湘農民）。我們看這次北伐軍入湖南以後，所到之處，都有廣大的羣衆爲之作種種關於軍事上政治上的有利

援助，各地的羣衆也很多是幫助北伐軍之行動，反對北洋軍閥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等，便可知這次北伐軍的環境與以前大不同了。然而由此我們便可說此次北伐是羣衆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北伐軍已經是羣衆的武裝，北伐已經是革命羣衆的軍事行動嗎？我們，革命者，不應欺騙自己，此次北伐雖然比以前進步了很多，可是還不能說是革命民衆的軍事行動，只能說是接近革命民衆或為革命民衆所贊成的軍事行動，這是我們可以從北伐軍的來源和內部的複雜看得出來的。北伐軍大部分是由小軍閥的軍隊投誠改名或改編的，如唐生智彭漢章王天培等，這些軍隊及其軍事領袖投誠國民政府固然於革命有重大的影響，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們昨天確還是軍閥的軍隊，還是小軍閥，他們跑到革命的門裏來還沒有幾個鐘頭，不用說他們不是革命羣衆自己的武裝，并且他們對於革命羣衆還有多少的懷疑與憂慮，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革命的黨——國民黨比以前固然進步了不少，已能指揮相當的羣衆，但是黨的力量還很薄弱，還說不上能指揮一切的政治和軍事，實際上還是幾個軍事領袖的作用，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至於羣衆雖然有了相當的組織，對革命有相當的認識，但在全中國全部的觀點上看，有組織的羣衆還只是很少一部分，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三萬萬餘農民，有組